温故创新 风谊长存

——缅怀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

刘军国

10月26日，得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逝世的消息后，我心里一沉，脑海中立刻浮现出5年前结束驻日工作前夕拜访他的场景。那天，他精神矍铄，亲切和善一如既往，提笔为我写下“温故创新”四个字作为纪念。

担任人民日报社日本分社记者期间，我曾数度走进福田先生的办公室，采访这位谦和睿智的长者，也经常在公开场合与他见面。福田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心系中日友好，秉持正确历史观。在他的首相任期内，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重要原则。作为有信义、有担当的政治家，他所坚守的和平理念与合作主张，为今天留下诸多启示。

薪火相承，筑牢根基

福田先生出生于1936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企业工作，后来担任他的父亲、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秘书。1990年，福田先生当选众议员，历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等职，于2007年就任日本首相。

福田先生对华友好的信念根植于家庭熏陶与时代亲历，体现了两代人的接续坚守。青年时期，福田先生便跟随父亲参与对华相关事务。1978年，福田赳夫与访日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谈及邓小平，福田先生总是满怀真挚敬意。一次采访中，他拿起纸笔，一笔一画写下“好好爷”（在日语中，有“性情温和、慈祥的老爷爷”之意）三个字，用这个质朴的称呼形容邓小平宽厚亲和、神采奕奕的风范。他饶有兴致地回忆当年的细节：邓小平参观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面对高度自动化、没有太多工人忙碌的车间，误以为工厂正值放假。当中方表达希望引进先进钢铁制造技术时，日方企业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先进的钢铁厂。每每忆及此段往事，福田先生都会感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抉择，为中国后来的腾飞拉开序幕。

福田先生就任日本首相时，中日关系刚刚历经一段波折。他继承父辈的友好志向，顶住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努力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第四个政治文件。声明承袭前三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确立的各项原则，明确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福田先生反复强调，四个政治文件是日中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是处理双边问题不可逾越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容动摇。

2012年，76岁的福田先生宣布退出众议院选举。告别政坛后，他依旧心系中日民间交往。2013年会见中国地方新闻干部访日团时，他借鉴访华期间学到的“正能量”一词，号召双方共同努力，不断积聚发展两国关系的“正能量”。





▲2021年，刘军国（左）结束驻日工作前夕，与福田康夫辞别时合影。 岳林炜摄

◀2018年，刘军国在位于东京的福田康夫办公室采访福田康夫。 蔡 虹摄

和福田先生交谈时，我常能同时感受到理性思辨与人文温度。2018年7月采访之际，我给他带去在长野县出差时购买的特色蜂蜜。福田先生当场拆开包装，拿起桌上的点心蘸着蜂蜜吃下，一边说着“好吃”，一边热情招呼我一同品尝。

那一天，聊起治国安邦的道理，他脱口而出孟子名句“无恒产者无恒心”。见我一时记不清典籍出处，他便径直走到桌子另一端，拿起电子词典检索原文，指着屏幕为我逐句讲解。这个细节令我真切感受到，福田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份跨越国界的文化共情，也是他数十年推动中日友好的精神源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福田先生视作解决世界纷争的黄金法则。他表示，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非常值得骄傲”，孔子等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在思考如何解决争端，保持团结。他说：“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坚持努力，最终就能缔造和平、守护和平。”

情系博鳌，胸怀亚洲

告别政坛的福田先生从未卸下民间外交的责任，常年奔走于中日交往与亚洲外交的多边舞台。他正视历史，胸怀亚洲共同发展的宏阔格局，用行动诠释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

2010年至2018年，福田先生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8年任期内，他频繁往返中日之间，积极致力于通过论坛凝聚亚洲共识、促进亚洲发展、提升亚洲影响力。

在福田先生看来，亚洲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民生改善日新月异，局势风云变幻，十分需要每年汇聚各国政商学界，研判形势、交换洞见，凝聚并发挥集体智慧。博鳌亚洲论坛，正承担起这份时代使命。他多次由衷评价，中国为亚洲搭建起一个重要的对话协商平台，为地区思想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福田先生高度认同。他认为，这一理念向世界清晰传递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福田先生来华访问数十次，足迹遍及多地。他亲眼见证，北京首都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沿途从昔日遍布农田，到如今高楼林立。他多次感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源于中国稳定的社会大局与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这种实践值得世界认真研究。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正视历史，方能开辟未来。福田先生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讲，他的历史认知源于童年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1942年，他尚是孩童，跟随家人辗转中国南京、日本东京和群马县。战火笼罩下的所见所闻，在他心底埋下对战争的厌恶。这一切身经历，促使他终生都强烈主张：日本应当直面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不能回避和歪曲历史真相。

2018年6月，福田先生专程访问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遇难者献上花圈表示哀悼，并亲笔题词“和平东亚”。他也是为数不多走进这座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馆内，他驻足细读侵华日军士兵日记等原始史料。离开纪念馆时，他特意带走一册馆方编纂的史料集。后来，在东京的采访现场，他还打开这本沉甸甸的资料集，向我展示。

福田先生对我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陈叙事客观公允，没有虚饰夸张。他多次呼吁更多日本民众前往参观，读懂历史，汲取教训。在福田先生看来，回望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警醒世人，避免悲剧重演。

福田先生坚信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心底珍爱和平、期盼安定。他常以樱花寄寓期许，盼望日中关系能如春日樱花盛放般，迎来温暖明媚的局面。

斯人远去，风范长存。福田先生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便是国与国相处当秉持大局。中日两国必须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坚持以史为鉴，把相互尊重落实在政策与行动上。民间交往是两国关系的源头活水，正如福田先生毕生所践行的那样，扩大人文交流，增进国民相互理解，以务实合作积累互信，化解隔阂与分歧。

樱花岁岁如期绽放。愿今天的日本政府珍视福田先生等老一辈政治家的心血和努力，歧途知返，反思并停止错误言行，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作出应有努力。

用双脚丈量长征

王秀涛

阅见世界



1983年8月，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让75岁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激动不已：他获准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得知消息时，他欣喜地写下：“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二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两年后，这次跋涉凝结成30余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见右上图，**资料图片**）。而这本书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另一本书。

1938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斯诺在书中用一个章节记述了长征，并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当时正在美国合众社工作的索尔兹伯里读后深受触动。1944年，同为战地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和斯诺在莫斯科相见。两人并肩报道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也常常谈起中国。索尔兹伯里后来回忆：“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想搞清毛泽东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艰苦历程。我得从头入手，这就是长征。”

真正走上这条路，又等了几十年。1972年，索尔兹伯里第一次来到新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沿长征路线采访、写一部完整长征历史的愿望。此后，他多次访华，并广泛搜集与长征相关的史料，直到等待已久的门终于打开。

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和妻子夏洛特飞抵北京。这位曾获普利策新闻奖、以实地调查和犀利笔触闻名的老记者不满足于档案和回忆录，他想亲眼看一看湘江的水、娄山关的雾、泸定桥的铁索。两个半月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时任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时任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他们几乎完全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走了一遍——主要乘坐吉普、面包车，在车辆无法通行时也步行或骑骡马，途经7个省份，行程约1.2万公里。

在金沙江畔的皎平渡，索尔兹伯里执意徒步走完15公里山路，抵达当年红军渡江的现场。然而返回会理当夜，他心脏病发作，被紧急送医——负责抢救的医护人员发现，索尔兹伯里的体内，早就植有一枚心脏起搏器。一周后，老人刚脱离危险，就继续行程。这枚伴随他重走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登上泸定桥，面对横亘于惊涛之上的13根铁索，索尔兹伯里在留言簿上写道：“在长征中，没有一次战斗或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拟，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的红军男女战士欢呼！”

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随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进一步使长征的伟大精神和动人故事为世界知晓。1986年，该书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首版很快售罄，并于此后数度再版。

这本书之所以成为海外长征书写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不仅因为索尔兹伯里坚信“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还因为他的写作建立在数百次采访和对档案文献的广泛访求之上。正文之外附有约4万字注释，几乎每一处记载都言必有据。更重要的是，索尔兹伯里没有把长征写成一首单纯的赞美诗，没有回避红一方面军出发时有8.6万人、抵达陕北只剩数千人的巨大牺牲，以及党内的争论、失误与分歧。作者以长征为切入点，呈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

在索尔兹伯里看来，长征这座“中国革命的熔炉”同时也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在记述长征故事时，他始终把人放在历史的中央。他描写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周恩来的缜密周全，红军将领的运筹帷幄，普通战士在绝境中的坚持；也写了毛泽东在湘江战役后的沉默与痛思，还有战士们的困顿和饥饿。

书中记下了长征路上坚忍无畏的女战士。敌机空袭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贺子珍扑在担架上负伤的团政委钟赤兵身上。弹片使她17处负伤，倒在血泊中。昏迷数日醒来后，贺子珍嘱咐护士不要让毛泽东知道——“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令人动容的还有炊事员们的故事。翻越大雪山时，他们坚持负重30余公斤，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物。在山顶，他们为抢救病人熬起鲜姜辣椒汤：“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热汤递给了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已牺牲了9名炊事员。

这些故事无疑解释了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畏的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思想……同时也表明，长征是中国的，但长征所展现的精神属于全人类。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索尔兹伯里的这些努力，使他的判断具有特别的分量——长征预言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他写道：“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在书中，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与当时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接续起来。如今，长征胜利已90周年，当年的“新长征”又走了很远。这本书不仅回溯了历史征程，更由长征出发，昭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千絮语

南非“茶”香

戴楷然

每当南非西开普省的夏日阳光洒向塞德堡山脉，山坡、荒原与岩石之间便会铺展出一片细密的绿色，那是南非“国宝茶”路易波士生长的地方。其实这种饮品不含咖啡因，单宁含量较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茶”，但它的饮用方式却与茶异曲同工：路易波士枝条细长，叶片呈针状，经加工后冲入热水，汤色便慢慢转为红褐，散发淡淡木质清香。

塞德堡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寒冷湿润，土壤贫瘠，多由砂岩风化形成，雨水容易下渗——对大多数农作物而言不够理想的生存环境，却成为路易波士赖以生长的家园。数百年前，生活在开普地区的传统部族科伊桑人已经懂得食用野生路易波士。他们进入山地采集枝叶，将其砍碎、捶打、堆放发酵，再置于阳光下晒干，最后煮水饮用。

18世纪70年代，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前往开普地区考察，他记录下当地人饮用路易波士的方式，为后人留下重要研究线索。相较于当时价格昂贵的进口茶叶，路易波士更易获取，口味也不错，因而被开普地区的欧洲定居者逐渐接受和喜爱。20世纪初，拥有茶叶贸易背景的俄罗斯移民本杰明·金斯伯格来到西开普省克兰威廉地区，他注意到路易波士的商品潜力，随即收购、加工和推广这种植物。1907年，路易波士作为南非乡土产品在英国伦敦的展会上亮相。

伴随需求增长，野生路易波士的过度采集和供应不足开始限制产业发展。20世纪20年代，南非医生兼植物爱好者彼得·勒·弗拉斯·诺蒂尔与当地农民合作，反复实验后发现，通过处理路易波士种子的坚硬外壳，可以显著改善其萌发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人工种植的成功率。20世纪30年代，最早的路易波士种植园在克兰威廉建立。自此，路易波士的加工生产逐渐由依赖野生采集转向商业化种植。

当地人从山野中认识它，植物学家记录它，商人将它带出山谷，研究者又帮助它走向规模化栽培……路易波士经历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重新发现”。在克兰威廉的博物馆里，这段历史有了实物注脚：这里陈列着20世纪初使用过的加工机器和手工工具、金斯伯格最初保存的路易波士样品盒，以及不同年代的包装。展览还呈现了这一植物从种子萌发、幼苗培育到采摘加工的过程。

如今，路易波士在南非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早晨的一杯热饮、午后的一次闲谈、家庭餐桌的茶壶中，都有它的身影（见右图，**资料图片**）。路易波士可以原味冲泡，也可以加入牛奶、蜂蜜、柠檬和各种香料。传统饮用方式之外，它也不断走入新的生活场景：当地企业将经过特殊处理的路易波士放进意式咖啡机萃取，开发出“路易波士浓缩”，又用蒸奶调制不含咖啡因的“红色卡布奇诺”。在南非不少咖啡馆，路易波士不再只有茶壶里的一种模样，还可以变成花式饮料和各类甜点。

曾任南非政府行政主厨、总统官邸经理的布雷特·拉兹在回忆录《马迪巴欣赏俱乐部》中写道，自己曾为曼德拉端上“一杯又一杯”路易波士。国家元首在会见宾客、处理政务之余，也有着这样寻常的饮食习惯：一只茶杯里的红褐色饮料，与普通南非家庭中的并无二致。英国畅销小说《第一女子侦探社》中，女主人公普莱斯·拉莫茨韦在博茨瓦纳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侦探社，她在接待客户、与助手对话或独自思考时，手边常放一杯热气腾腾的路易波士。

享受杯中醇香的同时，南非人并未遗忘路易波士的来处。当这种来自塞德堡山脉的植物成为商品，商业收益如何回馈最早积累其知识的科伊桑人？经过数年协商，科伊桑人代表与南非路易波士企业于2019年签署协议，加工企业每年按照农场收购价的1.5%缴纳费用，以协助科伊桑人保护传统知识与文化遗产，并促进社区教育和发展。传统部族社会留下的智慧，在现代生活中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现代产业的发展也开始反哺传统知识传承。

漫长岁月中，路易波士连接南非不同的地域和人群，也逐步走向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杯盏。人们不断改变食用这种植物的方式，也重新认识它与土地、与最早熟悉它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来自南非山野的一杯“茶”，有了更加悠长的余韵。



域外见闻

盐矿小镇

徐鹏辉

在奥地利北部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坐落着一座头枕群山、臂挽湖泊的小镇——哈尔施塔特。多年来，它以古老的历史、宜人的气候、静谧的环境与绝美的湖光山色，吸引游客慕名而至。

哈尔施塔特美在山水相融。从观景台俯瞰，湖水仿佛高山峡谷间飘扬的绿丝带，又似光滑明镜，倒映陡峭山崖与五彩斑斓的木屋。居民开门见山、推窗赏湖，露台花团锦簇，门畔木雕精巧，为小镇增添不少童话气息。湖里游鱼清晰可见，水面天鹅成群游弋，山间雀鸟展翅掠过，宁静之中生机盎然。

四季流转，小镇景致各有风韵，或笼罩于朦胧晨雾“犹抱琵琶半遮面”，或沉浸在和煦暖风“春来江水绿如蓝”。更吸引人的，是小镇骨子里的笃定与纯粹，那是山与水不变的安宁和自持。

小镇深埋历史文化富矿——欧洲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文化”正因这座小镇得名。公元前800年左右，铁已经成为此地居民锻造武器与工具的重要材料。青铜和铁制武器、青铜器皿以及希腊葡萄酒容器等器物在小镇大量出土，印证了哈尔施塔特的繁荣，也还原了当时小镇与地中海地区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在古凯尔特语中，哈尔施塔特与“盐”息息相关，埋藏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高纯度盐矿赋予小镇巨大财富。凯尔特人在公元前便发现此处有盐矿，靠开采岩盐积累财富。在没有冰箱与化学制剂的年代，可保鲜防腐的盐被视为“白色黄金”。大航海时代后，海盐普及，盐价下跌，但直到20世纪中叶，盐业仍是当地繁荣的根基。

如今，游览古老盐矿是小镇旅程中的一站。游人乘缆车上山，抵达盐坑后换矿工服深入洞穴，搭乘窄轨小火车抵达400多米深的地下，听导游讲解矿工的劳作日常，参观地下盐湖与古老的木梯。矿洞岩壁上的盐晶体泛着微光，通道里的灯影摇曳昏黄，和地下寒气一同提醒人们当年采盐的辛劳艰苦。

千里迢迢奔赴而来的人们，沉醉于哈尔施塔特的山湖与历史。在满怀期待的旅人心中，它不仅是奥地利的山间小镇，也是能安放浮躁、治愈心灵的世外桃源。山风拂过湖面，盐的咸涩混着草木清香漫开，那是属于哈尔施塔特的、跨越千年的独特气息。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rbgj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